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

中日教育发展比较

● 熊庆年 著 ●

巴蜀书社

○ 熊庆年著 ○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 中日教育发展比较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黄云生

封面设计：李文金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 中日教育发展比较

熊庆年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5号 (028) 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 册

ISBN7 - 80523 - 991 - 6/G·29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认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前提，对于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及其规律，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选择与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及历史条件相近的日本作为参照系，试图通过中日前代教育史的比较，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发生的历史基础，以弥补这个研究领域的不足。

本文采取比较历史学的方法，遵循可比性原则，选取具有矛盾同一性的若干问题，进行横向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综合，对历史的差异和独特性作出解释，以期分离出那些造成特殊条件的因素，作出客观的历史概括。

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日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具有严密的官学网络体系、兴旺的私学组织、完备的教育制度，高度发达的中国教育，经历了明清交替的动荡，在康、乾之世达到极盛，而后走向衰败。道、咸之时，颓废之势已不可止。日本教育在经历“战国时代”之后，官学教育体系荡然无存。进入德川时代，教育才缓慢复苏，逐渐建立幕藩官学，私学教育机构也不断增加。到十八世纪，教育受到广泛的重视，官学私学均有较大发

展。从十八世纪末起，社会教育热情高涨，中央官学系统化，地方官学普遍设立，为庶民服务的寺子屋蓬勃兴起，日本教育迅猛发展。

从政治的视角看，教育政策方面，中日有相当的一致性：尊崇理学，以文治国。但在具体目标指向上存在差异。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更有效的控制，实现封建集权下的高度集中统一。日本统治者为了寻求“道义”支持，巩固幕藩体制。因此，在政策实施上各有特点。中国是强烈文化专制，严厉的思想控制。日本推尊朱子学，但允许多元存在。在政策力度上，中国统治者对教育保持强烈的政治关注，日本统治者则倾向于实用主义的态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严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与完善的管理制度，形成了强大的国家教育管理机制。日本幕藩两级官学不相衔接，未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教育管理分散自主。中国高度集中的封建教育机制对发展封建教育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的惰性又使之缺乏组织竞争的活力和革新精神。日本松散的封建教育机制不利于国家控制的一面，但它又容易造成组织竞争，能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

儒学是中日传统教育理念的核心成分，又是教育的具体内容。儒学学术的发展牵动教育思潮的起落，又引导教育内容的更新。中日儒学发展的共同点是，程朱理学维持着正统地位，强烈的批判精神贯穿学术流变的整个过程，崇实为学术发展的主流。中日儒学的发展又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性。本土文化型的中国儒学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内动制约功能，异质文化型的日本儒学发挥了更多的社会外动制约功能。追寻传统以维持稳定体系的调适机制，使中国儒学的眼光一次次转向古典，以民族化为调适机制的

日本儒学，兼收并蓄，折衷多元，注重现实。中日两国儒学内部，都已萌发出具有近代因素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基本理论上，产生了要求个性解放、教育平等的思想。在教育制度上，出现了初步的民主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上，科学教育思想初露端倪。具有近代因素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早熟”，并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而在日本仍然没有脱离“侏儒式”发展的格局。中国教育思想新因素成长的非连续性，使之未能很好发挥启蒙作用。而日本教育思想新因素的成长保持了渐进和连续性，并逐步与吸收西方文明融合，对德川后期教育实践起到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西学东渐是中日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重要刺激因素。西方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的实验方法，使中日两国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发生着观念的变化。西学东渐在中日遭到的政治和文化的抵抗不同，因而其历程也不完全一样，结果也很不一样。康熙禁教之后，中国西学引进基本中断。日本禁教锁国后，仍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了与西学接触。从空间范围看，西教在日本传播倾向下层，传播面较广。在中国传播倾向上层，影响面比较窄。西学在中国主要通过传教士著述或向中国士人述译的方式传入，在日本主要通过日本人翻译和转述的方式传入，日本人较早获得直接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能力。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势，给西方教育观念的引进带来影响，中国少数先觉者的思想未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并唤起普遍的觉悟。而日本持续吸取西方教育的营养，带有近代因素的观念不断生长，为德川晚期大规模吸收西方教育方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民族心理因素给予教育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长久，长期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人盲目自尊，严重地妨碍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文化的相对后进和长

期的文化输入，使日本人养成了努力吸收、合理利用的受容心理。

“士”是中日两国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是教育的主体对象，士人教育的趋向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教育的特性。在明清科举制度之下，读书做官成了一般士人的基本教育价值取向，学校沦为制造官僚的机器。科举制度强化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消极因素，弱化了封建传统教育的积极成分。在文治和平社会，日本武士教育成为上层社会的身份修养。中国士人教育目标价值带功利性，是官本位的。日本士人教育目标价值取向是非功利性的，以提高身份修养为本位。功利的驱动使中国士人孜孜不倦，汲汲以求，甚至见利忘义，德行不修。日本士人读书是义务，是权利，所以不免贵族气。中国以科举制度为评价体系，评价以掌握古代经典和作文的能力为依据。日本未建立国家考试制度，人才评价按阶级身份区分，是非能力主义的。能力主义促进竞争，加剧功利化。非能力主义使士人教育注重教养。中国士人教育以“孝”为出发点，以主“仁”为归结点。日本士人教育同样以“孝”为出发点，但是其归结点在主“忠”。中国士人以内省为特征，日本士人以信奉为特征。因而中国士人多自随性，日本士人多从他性。在知识结构上，中国士人以执兵为耻，日本士人文武兼修。两国士人素质类型各异，对整个社会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商人是社会近代化中的一支“革命”力量，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弃儒从商在中国一些地区形成趋势，使商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道德水准提高。举业教育是中国商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仕途是主要的教育目标。日本社会流动的限制使商人的关注集中在发展家业，基础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由此得到

重视。与日本商人社会性教育形态不同，中国商人教育以宗族教育为基本形态。中国商人队伍的相对弱小，商人教育的宗族形态，使得商人教育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革新力量。日本商人队伍的相对强大、商人教育的社会性形态，使得商人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

反思两个半世纪中日教育对比的逆转，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前近代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教育的外部条件来看，政权的更迭、政局的动荡、过于集权的体制和政策失误是重要原因。从教育内部构成看，市民阶层的弱小、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影响了平民教育的发育。而高度政治化的精英教育在封建包袱的重压下，没有能够成为革新的引导力量。从思想上看，儒学的保守性束缚了教育思想新因素的成长。而民族心理中的盲目自尊，使中国教育思想家未能及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营养。沉淀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官本位意识，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潜流。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及其惯性影响了中国教育的进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A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bstract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oth by continuity and the fact that it develops by stag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heds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its law of progress. With Japan,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China both in term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s frame of refer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the author in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genesi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is is an area that needs research in China.

The first chapter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chapter two is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educational policies,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limitations toward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chapter three is a discussion of, with Confucianism as clue,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two countries; chapter four is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in both countries; chapter five, with emphasis on the variations of values in education the target of which is the so-called “gentlemen (shi)”, is a discussion of the national features of education in pre-modern China and Japan; chapter 6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ideals and forms of merchant education in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chapter seven is a reflection on the causes of backwardnes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education in pre-modern China lagged far behin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frequent changes in regimes, political upheavals, excessively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and mistakes in policies; second, the weakness of the civilian class, its immaturity and the elite education that is strongly flavored by politics did not become the leading force of change and reform due to the heavy burden of

feudalism. Moreover, the conservatism of Confucianism impeded the forming of new thoughts in education, and the blind self-pride in our national mentality desensitized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ward the excellent elements in western culture, thus causing their failure to absorb them.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s and values that place too much emphasis on bureaucracy are the obstac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assive fact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nertia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low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did have its historic reasons.

序 一

李国钧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君主专制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此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冲突，中外交往的频繁也是空前的。外国列强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这个“天崩地解”的历史时期，自然引起了意识形态和教育思想、制度方面的变革，进入了批判总结的朝代，即新时期将要来临的序曲。作者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教育史选题，研究其教育的嬗变及其同近代教育的关系，并与日本同时段教育的发展相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近代教育是教育现代化的起点，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至今仍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近代教育研究近年来受到教育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历史是一种文化积累，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教育作为文化的具体形态更是如此。历史的发展既有其阶段性，又有其连续性，近代教育是

“前近代”教育逻辑的发展。故我们必须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这样才能够发现更多的历史动因。本书以“前近代”为研究的视点，着眼于探讨教育近代化的“前提”问题，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教育由近代走向现代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十分有益的。

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是中国教育史研究正在开辟的一个新领域。张瑞璠、王承绪两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于1997年问世，诚如该书“前言”所云，中外教育史比较，“它要求把中外教育史放在世界历史大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就其所涉及到的广泛内容，可以说是融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及文化科技交流史于一炉”。由此可见，进行这项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熊庆年同志选择《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日教育发展比较》研究，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新开拓的学科前沿课题，是拓荒性的领域，尚乏先例，难度较大，不能不说作者有理论实践的勇气。同时，作者在研究中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而能够在这一新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比较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它本身也是非常丰富的。选择何种手段开展比较，也是对研究者学识的考验。本书不拘一格，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横向的，又有纵向的；既有分散的，又有综合的。作者特别注意从民族文化的层面去探寻，力图揭示教育的文化底蕴。我们通常说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传统教育都奉儒家教育理念为主臬，表现出较多的同一性。然而，两国传统教育其实存在着不少差异。儒家教育文化在日本的本土化，造就了日本教育文化的独特个性。而教育文化的个性，教育文化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合理

性，正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中的重要变化因素。

在作者研究的成果中，已揭示出中国教育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滞后于日本的多种历史原因：中国因封建政治的高度集中及文化专制主义，影响了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日本当时则多元并存，分散自主，致使教育胜于中国；两国当时都曾出现过近代因素的尊重个性、科学精神、初步民主思想和西学的输入，但中国曾产生发展中的中断，而日本则是连续不断的渐进；在西学传播的对象上，中国多在上层士人，而日本则倾向于下层，且受容性强；中国当时的精英教育，带有强烈的官本位功名倾向，而日本则重在身份性教养；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市民阶层未能壮大，“破块启蒙”的崇实教育思想未获得充分发展，且中国的市民商人教育多为宗族形态，明清之世终未脱离政治伦理型的教育模式，未制订出实验科学方法，而日本社会形态市民商人相对强大，成为教育发展及平民化的推动力量。这种对中日教育共性和个性的分析，对中日两国社会状态、民族性和教育理念的改革等差异的揭示，均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作者好学深思，刻苦钻研，有创造求实的学风，成功地运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辅以翔实的史料，写出了这一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1998年6月答辩时，受到一致的好评。我为中国教育史界能有此新人，而颇感欣慰。除草成数语权作为序外，并为此书的付梓，由衷地表示祝贺！

1999年3月于上海

序 二

杜作润

近年来，历史研究似乎不那么“景气”，连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发出了“历史研究究竟有什么用”的疑问。教育史研究亦未能幸免，教育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纷纷改行，一些教育史专家门庭冷落，全国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教育史研究》仍然没有得到“正式户口”，还只能内部发行。也不知道究竟是社会冷落了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研究者自己冷落了自己。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人过中年的作者走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天地，就显得有些不入“时流”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作者的可爱之处。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有对自己研究事业的执着，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应世的手段。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如果唯利是图，他也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文精神。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教育史研究本身也的确存在着观念更新、方法更新、提高研究水平的问题。二十年来，教育史研究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果，宏篇巨制的教育史著作也有了好几部。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已有的著作中，陈列资料者多，创新立意

者少；集体创作者多，自成一体者少；就事论事者多，鉴古观今者少。前几年，一些有见识的学者蕴酿教育史研究的突破，将比较教育与教育史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比较教育史这个新领域。本书作者抓住了这一契机，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就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倒是很会赶“时髦”、很入流的。不过，这个“时髦”并不让人觉得讨厌，倒还有几分新鲜。

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多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去寻找教育发展的原因。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注意了研究教育发展的社会外部条件，而且十分注意研究教育内部诸要素与发展的关系。在本书第六章、第七章专门分析了教育主体对象士人、商人的教育状况和教育价值观，从一个角度，深入研究了教育发展的文化内涵，写得很有特点。尤其是对商人教育的研究，在我看来，是富有创意的。作者通过中日比较，得出结论：平民教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与社会需求，中国前近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级相对弱小，市民社会不成熟，商人教育不发达，固守传统，影响了整个平民教育的发育，从而影响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这个观点具有启发性，值得深思。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创造更好的未来。与过分陶醉于往事一样，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不可能强大，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社会不可能健康。因此，缺乏对教育历史洞察的教育改革也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会有矢志之士加入教育史研究的行列。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教育史研究会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

持。香港孔安道有限公司基金会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就是证明。在此，我祝贺熊庆年博士本书的出版，感谢孔安道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